

七台河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七台河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七台河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
七台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六年

EA70/01
编 辑 委 员 会

主 任：高学仲

副主任：樊志海 赫惠珍 杜春兴

成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安祥 孙雪英 姚秉元 胡维君

唐帮奇 凌云尚 鲁春秋

目 录

七台河史话	杜春兴	(1)
心中始向北斗星	吴洪山口述 鲁春秋整理	(8)
古稀话往	王维新口述 孙雪英整理	(15)
难忘的岁月	吴玉清口述 葛崑升整理	(41)
我被日伪抓浮浪的遭遇		
.....	邹凤阁口述 贡雍巨整理	(46)
在光复前的日子里	苏学风笔述 鲁春秋整理	(54)
我被谢文东抓夫十九天		
.....	白万真	(62)
我与孙荣久	常维山口述 郭凤仪整理	(67)
杨国凤匪团的覆灭	于长海口述 孙伟利整理	(73)
青龙山集训改造土匪 ...	郭凤仪	(78)
七台河土地改革的回忆 ...	曹静波	(88)
七台河第一个卫生所		
.....	隋全儒口述 孙雪英整理	(108)
七台河第一座革命烈士碑		
.....	曹静波	(114)
忆解放初期干部作风		
.....	侯殿才 供稿 孙雪英整理	(118)

七台河地区解放初期群众业余文化活动			
.....	侯殿才	供稿	杜春兴整理(122)
七台河第一个猎民社			
.....	曹烽	供稿	凌云尚整理(128)
烽火硝烟炼傲骨	陈志强	口述	贡廉豆整理(138)
战斗英雄王玉臣的几次战斗回忆 ...			贡廉豆 (145)
七台河基督教	蔡昌春	供稿	杜春兴整理(154)
七台河佛教	蔡昌春	供稿	杜春兴整理(158)
我的尼僧生涯	释宝砚	供稿	杜春兴整理(162)

七 台 河 史 话

杜春兴

1907年，直接管辖七台河的依兰县（史称三姓）派往七台河两位打地委员，一叫胡子清，一叫肖井全，他们是给土地划界的。当时划定现在的万宝河以东归密山县管辖，万宝河以西归依兰县（三姓）管辖。给七台河这个地方定名为“七塔河”并载入依兰县志。

那时候，七台河还是一片荒原。罕有人迹，泡泽遍地，水草繁茂，高可没人。高山丘岭连绵起伏，到处是高大的白桦树、橡树、杨柳遮天蔽日，特别是宽阔的倭肯河两岸杂草树木丛生，高大的山核桃树，山里红、山丁子、臭李子布满了整个河套。当时的倭肯河里鱼类也甚丰富，有鲤鱼、鲫鱼、鲢鱼、河蚌、甲鱼等，不下几十种。山间草地中獐狍野鹿悠闲自得的逛来逛去，飞龙山鸡成群结队，铺天盖地。此外，木耳、蘑菇漫山遍野，俯拾皆是。当时的七台河的确是个山丰水肥的好所在。

1913年，从辽宁省凤城县嵩家店赶出了两辆马车，车主叫白文金、郭万库，还有一个人称曲四爷的，他们三家人乘两辆马车，漫无目的的信马由缰，直奔北大荒。那时庄稼人只想找个宽敞的地方，无拘无束

地种地生存，所以越是人烟稀少的地方他们越是要去。尽管旅途吃尽了千辛万苦，他们还是一直向北走，最终落脚“七塔河”，即现在老矿工医院以南的一片坡地上，选了背风、向阳、视野开阔面临一条小河的地点，搭起了房屋定居下来。这三户人家相距十几二十里而居，彼此相互照应。

那时七台河地面十分安宁，这几户人家真是过上了农家乐的生活。每到春夏，百鸟啾啾，花香鸟语。农忙一过，人们就在居舍左右捡采木耳、蘑菇，下河捕鱼捉鳖，其乐融融。冬季虽说是大雪封山，不便出门，可是也有许多乐趣。越是大雪推不开门的时候，出得门来越有收获，往往可抓到头扎在雪里，屁股朝天的山鸡。有时狍子为了觅食竟跑到了屋里。碰到好天气就去河里、泡泽打冰窟窿，捞鱼、捉田鸡，好不快乐。逢年过节，大家聚到一起喝自家酿造的黄酒，尽情享受山珍野味。

1914年春，从大连来了叫殷福国的一家。第二年又来了张元、张清等人家。从此，七台河添户进口，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所谓的村落也不似今天的村屯。当时有句话叫“十里为邻”。大家相距一、二十里，撒撒拉拉铺遍了七台河老街基一带，相安无事，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赋予的一切。

当时的行政辖区即以桃山的万宝河为界，万宝河

以西归三姓(依兰)管辖。万宝河以东归宝清县管辖。因交通十分不便,为了购买一些生产生活用品,特别是一到年节人们都聚到一起,花个十天八天穿山越岭到“三姓”购货。平时用个针头线脑什么的另有一种特殊的方法。说来有趣,在去往“三姓”的必经林间小路,两侧的大树上,钉了许多桦树皮小盒,这都是各家各户钉的。谁家需要针头线脑之类的小物件,就把样品和钱装在自家的盒里,有去“三姓”的人,无论是谁,都要往盒里看一看,如有样品就带走,捎回来后,连同剩余的钱放回盒里。隔个三天五日主人自会去取,并不知是什么人带回,更不需感谢,物品及钱从无丢失。

1920年,国民政府在勃利设县。那时七台河地区已发展到几十户人家,七台河从依兰划出,归勃利县管辖。说是管辖,其实,七台河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政府机构,加之距勃利也有六七十里路,在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勃利县对七台河的管辖也可算上鞭长莫及,很少有地方官员到过这里。但是,按当时的规定这里确设有百家长,百家长的名字叫鄂海山,由他代负地方事务之责。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七台河地方的生产生活也发生了混乱。有时人们聚到一起,预测着未来,有时又传说日本人要来七台河,人们整日生活在不安之中。其实,这深山里的百姓们不知道,从

1931年前,就有许多有识之士,热血男儿参加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人们也不时地听到一些抗日联军袭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随着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榨和疯狂杀害,特别是对反满抗日积极分子的野蛮屠杀,抗日联军也随着形势的发展经常转移到七台河地区深山密林中,抓住战机打击日本侵略者。当时经常活动在七台河地区的抗日队伍主要有抗联三军和四军。以七台河地区为根据地的三军四师师长郝贵林率部下百余人就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并创造一些可歌可泣的战绩。因而,七台河地区当时也有一些年轻人参加了抗日联军。如七台河红旗乡红胜村蒋成林,七台河矿务局的贾元祥等都是当时抗联三军四师少年连战士。

由于抗联的频繁活动,1935年春日本讨伐队和勃利县伪保安队组织了一百多人对七台河地区进行了第一次搜山,一无所获。因此,当时勃利县的日伪机构把七台河视为眼中钉,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1936年对七台河实行所谓“集家集村”政策,当时百姓们叫“归围子”,就是把居住分散的老百姓集中到一起,总计有200户人家左右。统统搬迁到了七台河老街基一带。1938年秋设立了警察署、村公所、协和会,之后又迁来了日本开拓团、成立了日本青年训练所,派遣了守备队,同时在七台河近区新修了简易飞机场,增设

了其它军事设施。从此，七台河进入了兵荒马乱时期。由于人口的增多，人员的复杂，七台河出现了5~6伙土匪，他们各有40——50人，时常出没乱抓乱抢。从日伪在七台河地区设立行政、军事机构后，加之土匪经常骚扰，七台河便鸡犬不得安宁。真可谓反动统治横行，社会残渣泛起，他们敲诈勒索、鱼肉百姓，抓人打人无恶不做，与此同时，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也开始随着这股浊水四处流淌。

1938年—1941年，这段时间，七台河这个遥远小山村基本形成了村镇模样。在现七台河老街基北起市粮食局饲料店，南到七台河市食品厂不到二华里的市面上，有不少商家店铺。同时另设立了一处管烟所，另有两家妓女院。一家“王梅堂”从勃利迁来。这家妓院有5——7名妓女。院址就在现今老三百的斜对面。还有一家称“大金仙”的，也是从勃利迁来的，只有一人，院址也是在三百斜对面。这两家妓院开的时间都不长，分别开业1——2年，后都迁到密山县。当时去这两家妓院的嫖客多是伪政权机关的人员，此外也有日本青年训练所的小青年和日本开拓团的人。那时当地百姓们时常看到他们骑着大洋马从六间、桃山一带飞奔七台河老街巷。商贾、百姓们去妓院的基本没有。七台河管烟所是1943年阳历二月成立的，由勃利县管烟所官派。有三名工作人员。每星期卖一次鸦片，吸食

大烟的有十儿人。就是这样一股祸水把当时的七台河搞得乌烟瘴气。

商家店铺大多是为当时的生产生活服务的小店铺,有的是夫妻店,有的是合伙经营,也有的是特务警察们开设的。较有名气的如:“长盛德”铁匠炉,“积盛福”国药店,“隆升祥”杂货铺,“供泰祥”杂货,“天私胜”杂货,“双河庆”杂货等。还有饭店、旅店、剃头铺、油房、粉房、豆腐坊、稻米所、皮铺、木匠铺。为生产生活服务可以说一应俱全。这些店铺有的开了十几年,有的开了六七年,也有的仅存了几个月时间。粉房、油房是季节性生产,忙过一季就停业。如勃利县“大成玉”粉房于1938年租勃利大地主王兆凤十余垧地专种土豆。除一个管事的外全都是雇工,土豆收获后加工成粉条,用马车运回勃利出售。有些店铺边开张、边倒闭,能坚持长久的没有几家。

“隆升祥”杂货铺是这些店铺中的佼佼者,从开张到关业十几年间一直平稳。“隆升祥”店主叫张日煊,来七台河时间较早,也算是开发七台河的老户。这个店所以能坚持开十几年,主要是代售当时的配给品。“隆升祥”杂货铺有五间房,二间自住,三间作店面,是由三家亲属合开的。共有资金三千元,主要经营生产生活用品,针头线脑,犁铧、鞭子、锄锹镐之类,还有农家日常穿用的靰鞡(一种用牛皮缝制的皮鞋),以及学

生用的笔纸墨等，自家还做一些糕点。但是主要的是代售当时的配给品，如火柴、盐、煤油、卷烟等。后期该店还代办邮政业务，代售汽车票，兼营照相业务等。以后曾连遭土匪两次抢劫，店铺日渐衰落。直至倒闭。

“长盛德”铁匠炉，是徐守功、徐守业哥俩合开。另有徐家铁匠炉的堂弟徐守祥单开的铁匠炉。这一家人是由山东打“行炉”来东北的。这期间他们走了近一年时间。所谓“行炉”就是推一个独轮车，上面装上小型炉具，风箱、砧子、大小手锤，外加一些碎铁。边走边揽活，有活计干一阵子，没有活推车再走。就这样，他们一家最终落脚七台河，作起了铁匠炉生意。那年头虽说生意不怎么好做，但维持生计还是可以的，他们之所以能把铁匠炉生意一直做到解放后直到公私合营，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的农业生产，车马农具离不开他们。这一家约在 1953 年加入当时的七台河铁工厂。

“积盛福”国药店是李国安、李国邦兄弟二人合开的。药店店址就在现在老三百右侧。店面约三间房大，座西朝东，南北向间隔，前堂做药房店面，摆放些药箱、药匣之类，后堂加工药材兼做住家。药店请了一位坐堂先生，先生姓宁，专管诊脉开方。李国邦除抓药外，兼看一些小儿科疾病。由于当时七台河交通闭塞，老百姓得个急病什么的，只靠这一家药店诊治。“积盛福”国药店一直开到解放后。

心中始向北斗星

吴洪山口述 鲁春秋整理

我出生在广东省丰顺县一个贫苦市民家庭，那时是1920年10月。靠父母节衣缩食和亲朋接济，我有幸读书至高中毕业。

当时，正值国难当头，日本鬼子的铁蹄从祖国东北、华北践踏到九州各地。举国上下哀鸿遍野，民怨鼎沸，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日热浪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这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抱着抗日救国的愿望，毅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官学校，三年后成了黄埔第十八期毕业生。

后来我在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当了教官，并集体加入了国民党。那时，我还看不清国共两党有何本质不同，都说要抗日救国，既然目标一致，我想，我从事的军事教学，培训抗日人才，自然也是抗日救国，因而干的认真，也很卖力。

1945年日本投降。内战烽烟又起，蒋介石四处调兵遣将，大举进攻解放区的企图已路人皆知。饱偿战乱沧桑的四万万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

言，一触即发的内战，使人民重又陷入迷惘之中。

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为了全民族的利益，不顾个人安危，亲临重庆进行国共两党和平谈判，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和平的希望，共产党的正确主张，顺民心，合民意，深受海内外同胞拥护。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形成一股有可抗拒的潮流。迫于这种舆论形势的压力，加之蒋介石需要有军事上的准备时间。于是作出一种和平的姿态，终于在和谈协议上签了字。

蒋介石打着“精减”军队的旗号，把我们这些不能直接参战的人编入一个军官纵队，一天天东走西逛，无所事事。在这段时间里，我常与同事们翻阅报刊，从中了解一些国内外形势。看得最多的是中央日报，有时还偷偷地看新华日报。给我的印象是，中央日报可信程度太差，诸多耳闻目睹的事实，总与其宣传内容大相径庭。新华日报则不然，道理让人服气，事实客观存在。当局对此控制很严，我们所能看到的新华日报，有时是在茶馆里无意中发现的，有时是在走街串巷偶尔拾到的。通过这个窗口，使我大开眼界，从中了解到一些解放区的新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虽然只是点点滴滴，凤毛麟角，却象迷茫中发现北斗星一样，顿觉心明眼亮，充满着希望和企盼。

在国统区生活的八年，反动的宣传和封闭的环境

使人窒息。看新华日报时头脑清醒，仿佛阴霾中露出一块湛蓝的天空；一看中央日报，却如同一下子迭进迷蒙的深谷。不过，久而久之总算明白一个粗浅的道理；八年抗战，老百姓已经很苦，内战不能再打，中国人不能再打中国人了！

记得在重庆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迄今令人难忘的事：“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一张大标语竟然贴在一辆公共汽车上。此事不亚于发生了一次地震，国民党当局如临大敌，惊恐万状；老百姓却暗中拍手称快，如同看到解放的曙光一样，喜上心头。

国统区里空气紧张，市面萧条，物价飞涨，早上能买一斤米的票子，晚上连半斤也买不到。大烟馆、妓女院，抢劫的、绑票的屡见不鲜；文官贪赃枉法，武官敲诈勒索，比比皆是；昼夜啸叫的警车，令人毛骨悚然，坐卧不宁。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腐败，实在令人作呕。

“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就象闪耀着的北斗，为我指明了方向，想起此事我就动心。可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个愿望呢？细一想，象我这样的国民党军官，共产党会相信吗？很显然，跟着国民党毫无希望，投奔共产党又走投无门，让人感到为难。

不久，蒋介石撕毁“双十协议”，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大举进攻。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组织了震撼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

军队的有生力量，国共两党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反攻开始了。

1949年，我在贵阳。国民党党政军要员纷纷逃往台湾，许多同事跟着走了，也有不少人下了“南洋”。一个姓丁的华侨劝我去马来西亚，我当时不想去台湾，也没有去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打算，处于十字路口，举棋不定。正在这时，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找到了我，劝我留下来，跟着共产党建设新中国。

我写了自传，把在国民党中的八年如实作了交待，还主动上交了党证和军校毕业证等。那些日子，我度日如年，总以为不是挨抓，就是受管制，不会有好果子吃。八年来，我虽然没给人民带来直接危害，但毕竟是蒋介石的学生，国民党员啊！

党的宽大政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参加了军管会组织的学习班，并介绍到军政大学学习。当时，主要是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国内外形势，学习毛主席《论持久战》、《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使我更深地了解了共产党，一颗悬着的心托了底。在学习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组织学习的党的干部，一点官架子没有，不打人，不骂人，还与我们同吃一锅饭，同干一样的活，重活累活抢着干，区区小事，使我悟出，共产党与国民党就是不一样，一方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民关系如同鱼水，一方却是等级鲜明，非打即骂。由此，使我

懂得了为什么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会在三年内打败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八百万反动军队。认识到，以前的八年，我确实走错了路。

这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轰轰烈烈地展开。我跟随两名党的干部参加了贵州省龙里县土改运动，发动穷苦百姓斗地主分田地。这个县有个恶霸地主叫宋伯涛，方圆百余里几乎都是他的土地。这个恶霸地主除了百般盘剥佃农之外，还养着民团，抢男霸女，无恶不做。通过忆苦，群众发动起来，斗倒了地主，分得了土地，使穷苦农民彻底翻了身。土改运动的锻炼，使我阶级立场，阶级觉悟发生了质的变化。对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有了更深的理解。

看到我思想上的进步，为发挥我的所长，1951年，党把我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步兵学校任教。党的信任，使我周身充满活力，我决心干出个样子来报答党和人民。别人带一个教学班，我带两个教学班，竭尽全力把平生所学贡献给新中国，八年之中，我直接培养出我军各级指挥员 240 余人，其中有不少当了将军。记得那时重庆步兵学校校长胡正平少将，就曾在我的班学习过。积极的工作态度，出色的教学成果，使我当上了 1955 年西南军区先进教学工作者。

1958 年十万官兵开赴北大荒。我随军北上，来到